

编者按:

史铁生走了一年了。一眨眼的事。

他留下的精神遗产还没有清点完毕——不久前,《收获》发表了他的遗作数万字,有随笔、小小说、书信;对他的追怀缅思还没有止息——中国作协在他逝世一周年时举办了“史铁生文学创作研讨会”,大家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和他对话。

对于如何继承他的精神遗产,我们也许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式,谨辑录其遗作及名家评论,再次缅怀。



昼信基督夜信佛

——史铁生遗作一组

随笔

昼信基督夜信佛

大概是我以往文章中流露的混乱,使得常有人问我:你到底是信基督呢,还是信佛法?我说我白天信基督,夜晚信佛法。

这回答的首先一个好处是谁也不得罪。怕得罪人是我的痼疾,另一方面,信徒们多也容易被得罪。当着佛门弟子赞美基督,或当着基督徒颂扬佛法,你会在双方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:努力容忍着的不以为然。

这表情应属明显的进步,若在几十年前,信念的不同是要引发武斗与迫害的。但我不免还是小心翼翼,只怕那不以为然终于会积累到不可容忍。

怕得罪人的另一个好处,是有机会兼听博采,算得上是因祸得福。麻烦的是,人们终会看出,你哪方面的立场都不坚定。

可信仰的立场是什么呢?信仰的边界,是国族的不同?是教派的各异?还是全人类共通的理性局限,以及由之而来的终极性迷茫?

人的迷茫,根本在两件事上:一曰生,或生的意义;二曰死,或死的后果。倘其不错,那么依我看,基督教诲的初衷是如何面对生,而佛家智慧的侧重是怎样看待死。

这样说可有什么证据吗?为什么不是相反——佛法更重生前,基督才是寄望于死后?证据是:大凡向生的信念,绝不会告诉你苦难是可以灭尽的。为什么?很简单,现实生活的真面目谁

都看得清楚。清楚什么?比如说:乐观若是一种鼓励,困苦必属常态;坚强若是一种赞誉,好运必定稀缺;如果清官总是被表彰呢,则贪腐势力必一向强大。

在我看,基督与佛法的根本不同,集中在一个“苦”字上,即对于苦难所持态度的大相径庭。前者相信苦难是生命的永恒处境,其应对所以是“救世”与“爱愿”;后者则千方百计要远离它,故而祈求着“往生”或“脱离六道轮回”。而这恰恰对应了白天与黑夜所向人们要求的不同心情。

外面的世界之可怕,连小孩子都知道。见过早晨幼儿园门前的情景吗?孩子们望园怯步,继而大放悲声;父母们则是软硬兼施,在笑容里为之哭泣。聪明些的孩子头天晚上就提前哀求了:妈妈,明天我不去幼儿园!

成年人呢,早晨一睁眼,看着那必将升起的太阳发一会儿愣,而后深明大义:如果必须加入到外面的世界中去,你就得对生命的苦难本质说是。否则呢?否则世上就有了“抑郁症”。

待到夕阳西下,幼儿园门前又是怎样的情景呢?亲人团聚,其乐陶陶,完全是一幅共享天伦的动人图画!及至黑夜降临,孩子在父母含糊其词的许诺中睡熟;父母们呢,则是在心里一遍遍祈祷,一遍遍驱散着白天的烦恼,但求快快进入梦的黑甜之乡。倘若白天挥之不去,《格尔尼卡》式的怪兽便要来祸害你一夜的和平。

所以,基督信仰更适合于苦难充斥的白天。他从不作无苦无忧的许诺,而是要人们携手抵抗苦难,以建立起爱的天国。

譬如耶稣的上十字架,一种说法是上帝舍了亲子,替人赎罪,从而彰显了他无比的爱愿。但另一种解释更具深意:创世主的意志是谁也更改不了的,便连神子也休想走走他的后门以求取命运的优惠,于是便逼迫着我们去想,生的救路是什么和只能是什么。

爱,必是要及他的,独自不能施行。

白天的事,也都是要及他的,独自不能施行。

而一切及他之事,根本上有两种态度可供选

择:爱与恨。

恨,必致人与人的相互疏远,相互隔离,白天的事还是难于施行。

唯有爱是相互的期盼,相互的寻找与沟通,白天的事不仅施行,你还会发现,那才是白天里最值得施行的事。

白天的信仰,意在积极应对这世上的苦难。

佛门弟子必已是忍无可忍了:听你的意思,我们都是消极的喽?

非也,非也!倘其如此,又何必去苦苦修行?

夜晚,是独自理伤的时候,正如歌中所唱:“这故乡的风,这故乡的云,帮我抚平伤痕。我曾经豪情万丈,归来却空空的行囊……”

你曾经到哪儿去了?伤在何处?

我曾赴白天,伤在集市。在那儿,价值埋没于价格,连人也是一样。

所以就,“归来吧!归来哟!别再四处漂泊……”

夜晚是心的故乡,存放着童年的梦。夜晚是人独对苍天的时候:我为什么要来?我能不能不来,以及能不能再来?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,莫非人们累死累活就是为了最终的一场空?空为何物?死是怎么回事?死后我们会到哪儿去?“我”是什么?灵魂到底有没有?……黑夜无边无际,处处玄机,要你去听、去想,但没人替你证明。

白天(以及生)充满了及他之事,故而强调爱。黑夜(以及死)则完全属于个人,所以更要强调智慧。白天把万事万物区分得清晰,黑夜却使一颗孤弱的心连接起浩瀚的寂静与神秘,连接起存在的无限与永恒。所谓“得大自在”,总不会是说得一份大号的利己之乐吧?而是说要在一个大于白天、乃无穷大的背景下,来评价自我,于是也便有了一份更为大气的自知与自信。

“自在”一词尤其值得回味。那分明是说:只有你——这趋于无限小的“自”,与那无边无际趋于无限大的“在”,相互面对、相互呼告与询问之时,你才能确切地知道你是谁。而大凡这样的时刻,很少会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,更多地发生于只身独处的黑夜。

倘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,拘泥于这一个趋于无限小的“我”,烦恼就来了。所谓“驱散白天的烦恼”,正是要驱散这种对自我的执着吧。

执着,实在是一种美德,人间的哪一项丰功伟绩不是因为有人执着于斯?唯执迷才是错误。但如何区分“执着”与“执迷”呢?常言道“但行好事,莫问前程”,“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”,执于前者即是美德,执于后者便生烦恼。所以,其实,一切“迷执”皆属“我执”!用一位伟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话说,就是“我的重要性”——一切“迷执”都是由于把自我看得太过重要。那巫士认为,只因在“我的重要性”上耗费能量太多,以致人类蝇营狗苟、演变成了一种狭隘的动物。所以狭隘,更在于这动物还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,来标定世界的真相。

那巫士最可称道的品质是:他虽具备很多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神奇功能,但并不以此去沽名钓誉;他虽能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另类存在,但并不以此自封神明,只信那是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;他虽批评理性主义的狭隘,却并不否定理性,他认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动、追求那无边的寂静中所蕴含的完美知识,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。我理解他的意思是:这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性,无论局限于哪一种都会损害生命的自由。这样,他就同时回答了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:无论生死,都是一条无始无终地追求完美的路。

是嘛,历史并不随某一肉身之死而结束。但历史的意义又是什么呢?进步、繁荣、公正?那只能是阶段性的安慰,其后,同样的问题并不稍有减轻。只有追求完美,才可能有一条永无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。或者说,一条无始无终的路,难以审美标准来评价,才不致陷于荒诞。

基督信仰的弱项,在于黑夜的匮乏。爱,成功应对了生之苦难。但是死呢?虚无的威胁呢?无论多么成功的生,最终都要撞见死,何以应对呢?莫非人类一切美好情怀、伟大创造、和谐社会以及一切辉煌的文明,都要在死亡面前沦为一场荒诞不成?这是最大的、也是最终的问题。

据说政治哲学是第一哲学,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,而分清敌我又是政治的首要。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:如果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,凭什么认为“及时行乐”不是最聪明的举措?既是最聪明的举措,难道不应该个个争先?可那样的话,谁还会顾及什么“可持续性发展”?进而,为了“及时行乐”而巧取豪夺他人——乃至他族与他国——之美,岂不也是顺理成章?

“但悲不见九州同”确是一种政治的高尚,但信心分明还是靠着“家祭无忘告乃翁”,就连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也难弥补“死去原知万事空”的悲凉与荒诞。所以我还是相信,生的意义和死的后果,才是哲学的根本性关注。

当然,哲学难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协。那是因为,次一等的政制也比无政府要好些,但绝不等于说哲学本身也要退让。倘若哲学也要随之退一等,便连城邦的好坏也没了标准,还谈的什么妥协!妥协与同流合污毕竟两码事。

佛法虚无吗?恰恰相反,他把“真”与“有”推向了无始无终。而死,绝不等于消极,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么一回事,全面地看看生前与死后都是怎么一回事,以及换一个白天所不及的角度,看看我们曾经信以为真和误以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么一回事……

故而,佛法跟科学有缘。说信仰不事思辨显然是误解,只能说信仰不同于思辨,不止于思辨。佛门智慧,单凭沉思默想,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学几千年后才弄懂的事,比如“唯识”一派,早已道出了“量子”的关键。还有“薛定谔的猫”——那只可怜的猫呵!

便又想到医学。我曾相信中医重实践、轻理论的说法,但那不过是因为中医理论过于艰深,不如西医的解剖学来得具体和简明。中医理论与佛家信念一脉相承,也是连接起天深地远,连接起万事万物,把人——而非仅仅人体——看作自然整体之局部与全息。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缚(比如礼仪习俗),使之在人体解剖方面有失仔细。而西医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,招招落在实处,对于人体的机械属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彻,手段高超。比如器官移植,比如史铁生正在享用着的“血

液透析”。

要我说,所谓“中西医结合”,万不可弄成相互的顶替与消耗,而当各司其职,各显其能,正如昼夜交替,阴阳互补,热情与清静的美妙结合。

不过,说老实话,随着科学逐步深入到纳米与基因层面,西医正在弥补起自身的不足,或使中医理念渐渐得其证实也说不定。不过,这一定是福音吗?据说纳米尘埃一旦随风飞扬,还不知人体会演出怎样的“魔术”;而基因改造一经泛滥,人人都是明星,太阳可咋办!中医就不会有类似风险——清心寡欲为医,五谷百草为药,人伦不改,生死随缘,早就符合了“低碳”要求。不过这就好了吗?至少我就担心,设若时至1998年春“透析”技术仍未发明,史铁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岁了,哪还容得我六十岁上昼信基督夜信佛!

世上的事总就是一利一弊。怕的是抱残守缺。

佛家反对“二元对立”,我以为,反对的是二元的势不两立。二元的势不两立,实际是强烈的一元心态。然而,这世界所以是有而不是无,根本在于二元的对立。所以,佛家实际是在强调二元和谐。一切健康的事物,都是基于二元的和谐,身体、社会、理想、修行……莫不如此。

“万法归一”是说这世界的本源,“三生万物”是指这个现实的世界。二者的位置一旦颠倒,莫说他史铁生了,众生的享年都要回零。

佛法之“空”,料与“空空的行囊”之“空”绝不一致。亚里士多德说,无中生有是绝不可能的。老子却说,有生于无。不过佛家还有一说:万法皆空。空即是有,有即是空,所以我猜佛家必是相信:有生于空。空,并不等于无。根本的二元对立,并非有与无的两极,而是有与空的轮回,或如尼采所说的“永恒复返”。

而“有”,也不见得就是有物质。有什么呢?不知道。物理学说,抽去封闭器皿中的一切物质,里面似乎还是有点儿什么的。有点儿什么呢?还是不知道。那就可以猜想一回了:有的是“空”!万法皆空,而非万法皆无,所以“空”绝非是说一切皆无。空不是无,空只好是有了。那么它又是一种怎样的有呢?空极生有,料必是一种无比强大

的势能!即强烈地要创生出无限时空、无限之可能性的趋势。创世的大爆炸,据说就始于一个无限小的奇点,这个“点”可否让我们对那个“空”有所联想?

说法跟科学有缘,佛门弟子多会引为骄傲。但若说二者问题也有同根,未必信众们就都能不嗔不痴。

所谓同根,是说二者的信念有一个相同的前提,即先弄清楚这个世界的究竟,而后,科学的理想叫“人定胜天”,佛法的心愿是“人人皆可成佛”。问题是谁都没说,如果世界尚未究竟或终难究竟,人当如何?就算可以究竟,究竟者也总在极少,尚未究竟和终难究竟的大多数又拿什么去作信的根基?我相信佛门确有其非凡的智慧,确有其慧眼独具的奇妙功法,能够知晓甚至看到理性所无从理解的事物。但是第一,这仍是极少数人的所能。第二,再强大的能力也是有限,因为无限意味着永不可及。第三,老调重弹——成佛是一条动态的恒途,绝非一处万事大吉的终点,然而,一个“成”字,一个“究竟”,很容易被理解为认知的极点与困苦的穷尽。

所以,一条同根,很可能埋藏了近似的危险:大凡理想或心愿,一旦自负到“人定胜天”,或许诺下一处终极乐园,总是要出事的。科学正在出事,譬如自然生态的破坏。信仰如果出事,料想会是在心态方面。

理想,若总就在理想的位置上起作用,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然而“言必行,行必果”一向是人间美德(柏拉图认为,政治可以有高贵的谎言,神却不可说谎),那么一旦行之未果——世界依旧神秘,命运依旧乖张,信仰岂不要受连累?

首先质疑它的就是科学。科学以其小有成果而轻蔑信仰,终至促生了现代性迷障。问题是,在实证面前,信仰总显得理亏——“看不见而信”最是容易被忘记。怎么办呢?便把“果”无限地推向来世。这固然也是一种方略,可以换得忍耐与善行,但根基无非是这么一句话:好处终归是少不了你的!可这样的根基难免另有滋生,比如贪心,比如进一步的谋略,直至贿赂之风也吹进信仰。

君不见庙堂香火之盛,有几个不是在求乞实际的福利!众生等不及“终归”——既可终归,何不眼前?这逻辑本来不错,更与科学的“多快好省”不谋而合!只是,这夜晚的信仰怎么就变得比白天还白了?

“不不,”于是有佛门高徒说,“这是误解,说明你还不懂佛!”随即举出诸多佛法经章、高僧本事,证明真正的佛说与那庙里的歪风毫不相干。

那,为什么您讲的就是真正的佛说?

那么你认为,我讲的对还是不对?

问题是,大众所信的佛法,未必跟个例高人所理解的一样。不管谁到那烟雾腾腾的庙堂里去看看,都会相信,这世上广泛流行的是另一种“佛法”。

如何另一种?

求财的,求官的,求不使东窗事发的……许愿的,还愿的,事与愿违而说风凉话的……有病而求健康的,健康而求长寿的,长寿而求福乐的,福乐不足而求点石成金或隔墙取物的……

那就是他们的事了。

怎么就成了他们的事呢?莫非也是佛说?

何为神说,何为人传,基督信仰千百年来都有探讨。哪是佛说,哪是人言呢?佛门也曾有过几次集结,高僧们相约一处,论辩佛法真谛,可惜这一路香火已断多时。失去大师们的不断言说与探讨,习佛已流于照本宣科,徒具其表。失去高僧的指点与引领,人性就像流水,总是要往低处去的。如今是人们由着性儿地说佛与“佛说”,人性的贪婪便占上风,众生要“多快好省”地上天堂,庙堂前便“鼓足干劲”地卖起票来。这类“信”徒,最看佛门是一处大大的“后门儿”,近乎朝中有人好办事。办什么事呢?办一切利己利身之事。如何能办到呢?耐心听“芸芸众生”们说吧,其津津乐道者,终不免还是指向某些神功奇迹——免灾祛病呀,延年益寿呀,准确或近乎准确地推算前世和预测未来呀……这些我都信,只不信这叫信仰。佛家(道家)的某些神奇功法我也见过,甚至亲身体验过,但我仍认为“看不见而信”才是信仰的根本。如果信仰竟在于某些神奇功法,高科技

为什么不算?科学所创造的奇迹还少吗?可就算你上天入地、隔墙取物、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,莫非这世上就不会有苦难了?没有了当然好,可那就连信仰也没有了。信仰,恰是人面对无从更改的生命困境而持有的一种不屈不挠、互爱互助的精神!

听说有人坐飞机赶往某地,只为与同仁们聚会一处,青灯古刹、焚香诵经地过一周粗茶淡饭、草履布衣的低碳生活。想来讽刺,那飞机一路的高排放岂是这一周的低消费所能补偿!真是算不过这笔账来?想必是另有期求。

又据说,有位国人对西人道:“还是我佛的能耐大。瞧瞧你们那个上帝吧,连自己儿子的死活都管不了!”

先不论基督与佛均乃全人类所共有,岂分国族!却只问这类求佛办事的心态,原因何在?说到基督与佛,何以前者让人想到的多是忏悔,后者却总让人想起许愿?忏悔,是请神来清理我的心灵,许愿,却是要佛来增补我的福利。忏悔之后,是顺理成章地继续检讨自己;许愿之后呢,则要看佛的态度,满足我愿的我为你再造金身,否则备选的神明还很多。

哈!这不过是你的印象罢了。事实上,此类信徒各门各派里都有。

那么,您是否也有与我相同的印象呢?

印象能说明什么!可有什么“统计学”证据吗?

“现象学”的行吗?现象之下自有其本质在,正如佛说“因果”。

……那么你的“夜晚信佛法”,到底信的什么?

首先我相信佛法是最好的心理疗法。佛看这人间不过是生命恒途中极其短暂的一瞬,就好比大宴上的一碟小菜,大赛前的一次热身,甚或只是大道上的一处泥淖。佛的目光在无始与无终之间,对于这颗球体上千百年来的蝇营狗苟,对于这一片灯红酒绿的是非地、形同苦役的名利场,说到底,佛是一概地看不上!而如今的心理疾病多如牛毛,又都是为了什么?比如说方兴未艾的

“抑郁症”,你去调查吧,统计吧,很少不是因为价值感的失落。说白了,就是“我的重要性”一旦在市场上滞销、掉价、积压而后处理,一向自视重要的“我”便承受不住,“抑郁症”即告得手。佛所以是最好的心理医生,因为他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市场价格,坚定了生命的恒久价值。而这样的疗法,还是那句话:很难在叫卖声声的白天里进行,而要等到夜深入静。

说到这儿想起件事,前不久与朋友谈起“城市文学”。“乡土文学”谁都知道,可什么是“城市文学”呢?两个人说来说去,忽有所悟:“城市文学”的特点,根本在一个“市”字上。城市,乃市场的引发,而市场的突出作为是价格的诞生。正所谓异化吧,价格功高镇主,渐渐就脱离价值而自行其是了。于是乎讨价还价,袖子里掐手指,而后发展到满街贴广告和电视台上吹牛皮……原本是为了货通有无的集与市,慢慢竟变成了骗术比拼的大赛场。败下阵来的自然是郁郁寡欢,待其两眼发直、浑身发抖,便取名为“抑郁症”。有趣的是,先是亏本者抑郁,慢慢演化,亏心者倒荣耀起来,称为“成功人士”,其居住地宏伟壮观谓之“高尚社区”。久之,价格成长为重中之重,价值一败涂地。成者王侯败者寇。怕为寇者,或打肿自己充肥,或就做成宅男宅女不见天日,想起市场就显露出“抑郁症”所规定的种种征候。

其次我相信,佛家对死后的猜想并非虚妄。看看那些大和尚,圆寂之时是何等的从容淡定,你自会相信那既非莽汉式的无畏,亦非志士般的凛然,而是深思熟虑,一切都已了然于心,或就像那位印第安巫士所说:一切都已“看见”。当然了,此等境界绝非吾辈常人所能为之——譬如爱因斯坦看见了时间的弯曲,譬如霍金看见黑洞,咱咋就啥也不见呢?故凡俗之如我类,切莫指望什么神功奇迹,不如原原本本都留给极少数人吧。

不过呢,死亡毕竟在向你要求着态度。当然回避也是一种,勇敢也是一种,鲁莽还是一种——两眼一闭跳下去,跟蹦极一般。我选择钻牛角尖,死乞白赖地想一想,谁料结果却发现:死是不可能的。

死是什么?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,什么、什么都没有了。可什么、什么都没有了,怎么会还有个死呢?什么、什么都没有了,应该是连“没有”也没有了才对。所以,如果死意味着什么、什么都没有了,死也就是没有的。死如果是有的,死就不会是什么、什么都没有了。故而“有”是绝对的。

“有”又是什么呢?有,是观察的确认——现代物理学也明确支持这一观点。“无”呢?“无”也一样是观察——准确说是观察所不及——的确认,因而仍不过是“有”的一种形态。推而演之,死也就是生的一种形态。

那么,观察意味着什么呢?观察意味着观察者的确在。而这个观察者,既然能够认知他者,也就一定能够自认。这自认,便创生了“我”。

“我死了”,此言若非畅想,就一定是气话,现实中绝没有这回事。

“你死了”呢,或用于诅咒,或用于告慰。前者是说,你没死但你该死。后者是说你并没有死,不过是到了另一世界,或处于另一种存在状态罢了。

只有“他死了”这句话没毛病,必有相应的现实为之作证。比如说“史铁生死了”,这消息日夜兼程,迟早会被证实。(由此也可见,我是我,史铁生是史铁生。)

总结一下吧:死,绝不意味着什么、什么都没有了。而一切“有”都是被观察的,一切“无”都是观察所不及的。所以“有”也好,“无”也好,都离不开观察者。那么,谁是最终的观察者呢?“我”!而“你”和“他”,“我们”、“你们”和“他们”,都不免是被观察者。

最后一个问题:设若真有来世,我怎么能认出此一世的我即是彼一世的我呢?首先,无论哪一世的你,不自称“我”又自称什么?其次,柏拉图说“学习即回忆”,被回忆者是谁?第三,一生止于吃喝屙撒睡的人太多太多,想必来世也就难于分辨,而一个独特的心魂自然就便于被回忆。(以上四小节均引自史铁生作品《论死的不可能性》)

在我想,求“往生”是不是有点儿多余?今生、来世其实是一样的,吃喝屙撒睡的固然一样,

特立独行的也是一样,不知不觉的固然一样,大彻大悟的就更应该能看出些一样来。什么呢?生即是苦,苦即是生。如此又求的什么来世!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,明天就是前天的后天……生还是苦,苦还是生,又何必在意此一生还是彼一生呢?我只相信,明天的意义,唯在进一步完美行动的可能。不过这已经有了保证:佛的目光在无始无终之间——史铁生要死就让他死吧,“我”才是那目光的无限仰望者与承受者。

那么“脱离六道轮回”呢?说真的,我半信半疑。所信者,你下辈子可以不是人、畜牲、饿鬼等等;所疑的是,莫非你可以是“无”吗?你只要是“有”那就麻烦。“有”就是“有限”,正如“无限”其实就是“无”。你看吧,哪一种“有”不是有限的?你想吧,唯观察所不及者谓之“无”,而那正是因为它的无限。这样我们就有救了,就算我们有一天不再是人,也不是畜牲、饿鬼和什么什么,我们总还得是“有”(因为“无”是无的呀),进而就还得是“我”。“我”位于有限而行一条无限的路,那才是佛或上帝的恩宠!

而一条无限的路,正所谓日夜兼程,必是昼夜轮换的路!如果黑夜过于深沉,独善其身或自在之乐享用得太久,就好比心病患者会依赖上心理医生,人是会依赖于黑夜而不得逃避白天的。然而白天就在黑夜近旁。不能使病者走进白天的医生是失败的医生,他培养了另一种“我执”。

况且此“执”是因乐而生。譬如乐不思蜀,乐具腐蚀,岂止是不思蜀,其实是不思苦,进而养成享乐的贪图。乐无止境,难免日趋狭隘,偶像繁多,倒给“菩萨”们都分配了工作,管升官的、管发财的、管文凭和职称的……最后连掩盖罪行都有专管。尤其,这享乐与灭苦的期求,一旦进入白天,与疯狂的市场合谋,爱愿常不是它们的对手。

所以我想,佛门弟子要特别地看重地藏菩萨。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,“地狱不空誓不成佛”,地藏的这两句伟大誓言,表明他是一位全天候的觉者!虽然一个“成”字似乎还是意味着终点,但他把终点推到了永远,从而暗示了成佛之

路的无限性。道路的无限即是距离的无限,即是差别的无限,即是困苦的无限,也便意味着拯救之路的无限,幸而人之不屈不挠的美丽精神也可以无限——唯此,无始无终的存在才不至于陷入荒诞。

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”简直就是十字架上真理的翻版,“地狱不空誓不成佛”明显与基督精神殊途同归。是呀,一切黑夜的面死之思,终要反身投入到白天的爱愿(当然,一切爱愿总也要面对死的诘难)。

你会发现,白天的事难免都要指向人群,指向他者,因而白天的信仰必然会指向政治。但政治并不等于政府,否则有政府的地方就不该再有不同政见。因而,政治的好坏也就不取决于国的强大与否,而在于民之福惠。国之强大,仅仅是为了保卫民的福利,否则何用?所以,以强大为目的的政治是舍本求末,以爱为灵魂的政治才是奉天承运,才会是好政治。

然而,爱也是有危险的。比如以死相威胁的“爱情”,比如期求报答的“友爱”,比如只为谋权的“爱国爱民”,比如盛气凌人甚或结党营私式的种种“信徒”……问题是鱼目混珠,真假何辨?其实呢,以平常心观之,真假自明——正所谓“人人皆有佛性”,也正是神在的最好证明。

我有个朋友,初到某地,两眼一摸黑,有个老太太帮他渡过了道道难关,他说我可怎么报答您呢?老太太说:你去帮助别人就是。我听说有个过马路的老头儿,四望无车无人,却还是静静地等候红灯。人说您这不是犯傻吗?他说:我不知道在哪个楼窗里,会不会有个孩子正看着我。我还知道有位女士,不知听哪个昏僧说,促成一桩婚姻便为来世积下一份善缘,于是不遗余力地乱点鸳鸯谱——管他们有情与无情!

爱的危险还有一条:仅仅的爱人。您信吗?仅仅的爱人,会养成铺张浪费,甚至穷奢极欲的坏毛病——情形就像被溺爱的孩子。所谓“爱上帝”说的是什么?是说要爱世间一切造物。所谓“爱命运”说的是什么?是说对一切顺心与不顺心的事,都要持爱的态度。

“我执”多种多样,并不以内容辨,无论什么事,一旦“我的重要性”领衔,即是“我执”。譬如常说的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,尤其前面再加一句“为天下人”,都是再好没有,但请留神,“我”字一重,多么慷慨大义的言词也要变味。不过,这事最为诡异的地方是:一味地表现“自我”是“我执”,刻意地躲避“自我”还是“我执”,趋炎附势的是“我执”,自命清高的还是“我执”,刚愎自用的是“我执”,自怨自艾的也是“我执”。那么“我”就得变傻子吗?对不起,您又“我执”了。我什么都不说成吗?成是成,但这仍然是“我执”。简直就没好人走的道儿了!不,这才是好人走的道儿呀:好人,才看见“我执”,才放弃“我执”,才看见放弃“我执”有多难,才相信多难也得放弃“我执”——这下明白了,成佛的路何以是一条永行的恒途。

《伊索寓言》中有一篇说到舌头,说那是人间最好和最坏的东西,因为它可以说出最美和最丑的语言。信仰的事着实跟舌头有一拚,它既可以让行无比的善,也可让人作滔天的恶。譬如曾经和现在,也譬如此地和别处,人们为信仰而昏昏,也为信仰而昭昭;为信仰而大乱,也为信仰而大治;为信仰而盛气凌人,也为信仰而谦恭下士;为信仰而你死我活,也为信仰而乐善好施……再问何根何源?以我的愚钝想来,大凡前一类都是那个“我执”。

如何灭尽“我执”呢?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,因为我感到我永远都灭不尽那玩意儿。我感到我只能是见一个杀一个,没什么彻底的办法。我感到诚实是第一位的,比如说白天就是白天,黑夜就是黑夜。黑白颠倒你试试看,或者只需想一想,会不会把白天弄成了自闭症,一到夜里又妄想狂?

2010- 11- 4

小小说三篇

恋人

八十岁,老吴住进了医院的病危室。一步登天的那间小屋里,一道屏风隔开两张病床,谁料那边床上躺的老太太竟是他的小学同桌。怎么知道的?护士叫到老吴时,就听那边有人一字一喘地问道:“这老爷子,小时候可是上的幸福里三小吗?”老吴说:“您哪位?”“我是布欢儿呀,不记得了?”若非这名字特别,谁还会记得。

“五年级时就听说你搬家到外地去了,到底是哪儿呀?”

“没有的事,”老吴说,“我们家一直都在北京。”

屏风那边沉寂半晌,而后一声长叹。

布欢儿只来得及跟老吴说了三件事。一是她从九岁就爱上老吴了。二是她命不好,一辈子连累得好多人跟着她倒霉。布欢儿感叹说,没想到临了临了,还能亲自把这些事告诉老吴。

哪些事呢?小学毕业,再没见到老吴,布欢儿相信来日方长。中学毕业了,还是没有老吴的消息,不然的话,布欢儿是想跟老吴报考同一所大学的。直到大学毕业,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,老吴仍如泥牛入海,布欢儿却是痴心未改,对老吴一往情深。一年年过去,一次次地错过姻缘,布欢儿到了三十岁。偏有个小伙子跟她一样痴情,布欢儿等老吴一年,他就等布欢儿一年。谁料,三十七岁时布欢儿却嫁给了另一个人,只因那人长相酷似老吴——从他少年时的照片上看。

“这人,还好吧?”

“他就不算个人!”

为啥不算个人布欢儿也没说,只是说,否则母亲也不会被气死。

那人之后布欢儿心灰意冷,很快就跟第一时间向她求婚的人登了记。婚后才发现,这人还是长得像老吴——从少年老吴的发展趋势看。

“怎么样,你们过得?”

“过是过了几年。可后来才知道,咱是二奶!”

“这怎么说的!”

怎么说?布欢儿一跺脚,离婚,出国,嫁个洋

人,再把女儿接出去上学……一晃就是二十年。有一天接到个电话,是当年那个一直等她的小伙子打来的。

“过得还好吗,你?”

“还是一个人,我。”

“咋还不结婚呢,你?”

“第一回我被淘汰。第二回我晚了一步。第三回嘛,这不,刚打听到你住哪儿。”

“唉,你这个人哪!”

“我这个人性子慢。你呢,又太急。”

约好了来家见面,布欢儿自信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,可门一开她还是惊倒在沙发里:进来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老头儿……

老吴回普通病房之前,拄着拐棍儿到屏风那边去看了看他的同桌。

四目相对,布欢儿惊叫道:“老天,他才真是像你呀!”

“你是说哪一个?”

“等了我一辈子的那个呀……”

这是布欢儿告诉老吴的第三件事。

2010- 11- 12

猴群逸事

群山幽谷之间,地势陡然舒缓,密林流溪,野兽出没。父辈们于此掘沟竖网,铺路架桥,建起一座野生动物园。若干年后,阿迪承其父业,在这里照看猴群。

某年围网失修,走漏了猴王麦。群猴不可一日无主,阿迪忧心忡忡。麦未走时,年轻的闪与雷即已各怀雄心,如今天赐良机岂可坐视?于是“烽烟”顿起。优胜劣汰,天经地义,阿迪暗喜。

谁料二猴势均力敌,久战难分胜负。猴群遂分两派,各拥其主,相互厮杀,恰所谓“战斗正未有穷期”。阿迪转喜为忧,深知一山难容二虎,否则两败俱伤事小,猴群的长治久安才是重中之重。

久观战事,见闪每占上风却不足胜雷,阿迪心生一计,移雷别养。

闪称王,猴群治。

雷呢?虽是阶下囚,却如座上宾——住单间,吃小灶,可谓万事无忧。怎奈猴群的吵闹声不时

隔山入耳,又不免心烦气躁。阿迪深感对它不住,常来探望。雷或怒目圆睁,或掉头面壁。阿迪走后,雷绝一回食,发一顿狠,听听猴群那边依旧歌舞升平,也只好睡吧——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。

雷的精神日渐委顿,胃口亦趋低迷。阿迪不忍,偶尔放他出来过过风。一日放风归来,阿迪有意无意地忘记锁门,回身再看时,雷已风行于崇山峻岭之间。阿迪唏嘘半晌,喜忧参半。喜的是,雷已重获自由;忧的是,它会不会养精蓄锐再来争王?

所幸雷一去不归,反惹得阿迪时有牵挂。

数年后阿迪进山采药,途遇一孤身老猴,或前或后地总是跟着他。疑为雷。投食引之,不理不睬。挥拳驱之,不惊不媚。开怀迎之,那猴似笑非笑,作揖顿首,而后款款离去,隐于深山。

2010- 11- 17

借你一次午睡

苏苏午睡醒来,发现邻居邝婶坐在窗前看报纸。苏苏说,邝婶您怎么在这儿?邝婶说蒙蒙你做啥梦啦,一股劲儿笑?苏苏一愣,再看四周,怎么不是自己家呢?邝婶也忽有所悟似的,说好好好,苏苏你醒过来就好,我叫你妈去。

这是哪儿呢?我怎么跑这儿来了?墙上的照片都是谁?噢,有邝婶。苏苏明白了,这是邝婶家。

这时候噉噉嚙嚙地来了不少人,围定苏苏,大气不出地看着她。

“苏苏,是你吗?”阿婆带着哭腔扑过来。

这下众人才都敢问了:苏苏是你吗?苏苏你到底怎么回事呀?苏苏你啥感觉……甚至还有人问,这些日子上哪儿啦你,苏苏?

苏苏有点儿懵:窗外怎么下着雪呢?人们怎么都穿了棉衣呢?莫非到冬天了?可午睡前还是夏天呀?

“怎么回事呀,妈妈?”苏苏有些怕了。

妈妈搂紧她说:“苏苏你别怕。你还记得吗,去年暑假的一天中午,一觉醒来,你忽然说起蒙蒙的话来?”

“蒙蒙?谁是蒙蒙?”

“蒙蒙是你邝婶的大女儿。”

“邝婶还有个女儿?”

“唉!” 邝婶叹道,“她走的时候还没有你呢。”

妈妈说:“那个中午以后,你除了长得还是自己,可说话、做事、一颦一笑全都像蒙蒙了,而且非要住到邝婶家来不可,管邝婶叫妈,管我倒叫开阿姨了……”

邻居们说是呀是呀,苏苏你简直就变成蒙蒙了,没人不相信你就是邝婶的亲闺女的,对邝婶那叫一个好……

苏苏心里有些头绪了。那个中午很热,游泳回来倒在床上正要睡,进来个姑娘把她摇醒,说苏苏帮我个忙吧,说着拉起她就走,直走进一个大花园。姑娘说苏苏你就在这儿看花吧,我就回来。苏苏先是觉得好无道理,后便让那铺天盖地的牡丹花给迷住了,孩子脸似的花朵,五颜六色,争奇斗艳……不一会儿那姑娘回来了,说行了,苏苏你回吧。苏苏正要走,姑娘又拉住她,说我可怎么谢你呢?苏苏说不用。姑娘想了一会儿,说我有件真丝手绣的旗袍你穿上肯定合适,这样吧,回去你朝我妈要……

苏苏把这梦说给众人。邝婶翻箱倒柜,果然找出了一件蒙蒙生前的旗袍,苏苏穿上,无比的合身。

2010- 12- 3

书简

给王安忆的信

安忆:你好!

电话实在不是一种好的交流工具,还是写信吧。

从你的意见中我感到,你期待于《丁一》的是美好理想,或爱情升华,所以你认为写到“戏剧乌托邦”就够了。但我的着眼点更在于理想的继续,或理想的疑难。

再美好的理想,若一旦付诸实现便要倒塌,人们就会放弃对它的信任。比如爱情,时髦的意见是说压根就没有那回事,有的只是婚姻或性。怎么会这样?就因为,爱情,作为理想自有千般妙

境,而一入实际则难免疑难种种。疑难的根本在于:①没有哪种理想是不希望实现的。②但理想是很难自然而然、原原本本地实现的,尤其是关涉到他人。③因此,常要借助权力来推行或维系。④结果无非两种:一是理想实现,推行和维系者功成身退;一种是权力壮大,而理想衰亡。

因此可以说:理想的难点并不在于它的诞生,而在于它的继续。事实上,已没有什么不同于先人的理想可供诞生了,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在历史中屡屡有过,但屡屡的结果常不如愿,尤其,美好的理想竟可以导致惨痛的现实。

所谓美好理想,可由一个“爱”字概括,即无论什么信仰终归都要落在对他者(别人)的态度上。作为他者之一的自然力量,说到底是人所不能改变的,人能够期求改善的从来都只是人与人的关系,或人对其类的态度。爱所以是一种理想,而不止于性。

作为理想,爱注定要指向普遍。然而,爱若真能普遍,爱即消失。或许应该感恩:也正因为爱难于普遍,这理想才不会耗散。做点浪漫的猜想吧:也许,性爱,正是上帝的一片苦心——把爱的种子,保存于两性之间。上帝把人分开两半,让人在最小的单位(个体)上亦不得独自完整,这很像是为人类预制了一个绝难违背的命令——亲和,或爱的趋向。事实正也是这样:人不可能不向往他者。

所以我说,性爱是一切人类理想的源头,或征兆——亚当与夏娃的头一宗愿望就是相互寻找。但这源头或许还算不得理想,唯当人的眺望更加辽阔、期待这一美好情感能够扩展到更大单位(比如说种群、国家、人类)之时,理想才算诞生。然而,大凡理想没有不希望它实现的,而且这不是错误,虽然它非常可能引出歧途,甚至于导致悲惨的现实。

话于是就说回来了:①这理想好不好?(丁问)②好,但不等于行。(娥说)③为什么不行?(对此依有所答)④就算三人行,再扩大些怎么样?(秦汉语)⑤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:那么理想还要不要有(假设是好的)?要的话,应该放在怎样的位置上?(《丁》文的回答是:戏剧!)⑥戏剧的本质,所以是梦想可以实现的地方,而不单是模仿已在之物的场所。戏剧是心与心的约定,梦与梦的沟通,是于

现实之外的另一次生命实现。⑦因而戏剧还包含了一个隐喻:理想虽不都可以实现,但理想仍要保存,仍要倡导。唯有戏剧(泛指艺术)才是超越时空的可能,而非来世。来世不过是前世的今生,生命的处境不会在那儿有质的改变(对此,丁一与那“老魂”有过探讨),唯不屈于现实的梦愿才可超越现实之维的束缚(所以离开丁一,我仍要追寻,尽管这追寻未必不会再次败于某丁)。因而可以说,爱的意义或理想的本质,更在追寻。(所以,“因为我的寻找,夏娃她必定在着”。)⑧但人毕竟难逃现实。就算丁、娥、萨成功了又怎样呢?一个巨大的白昼(所谓“正常生活”)仍在四周——这不是上帝的错误,但理想的位置并未解决。所以,我以为我并不是在写一个“三人恋”或“一夫多妻”。⑨“世界大舞台”与“舞台小世界”的区别(秦汉语)常被忽略。实现理想的诱惑,是人难于抵挡的(蛇看得清楚:人想当神,其实又当不成神)。而一旦要把那个“戏剧乌托邦”做成现实,毫不妥协地推行或维系,强权也就很现实了。强权未必都有一个丑恶的出发点。

以上是与你第二次通话之前写的,大概陈述了我写《丁一》的初衷与思路。我知道,我们要想互相说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但我既然写了(因为“透析”和来人,用了好几天),就还是给你看看吧。我不是会说感谢之词的人,但我还是得说,你、肖元敏和陈村对我一向的爱护我是太知道了——我希望你怀疑什么也别怀疑这一点。我是个固执的人,这毫无疑问。其实我看重的事就那么几件,现在,其中的两件有了矛盾。想想挺有意思,我们的“乌托邦”中发生了意见不一,幸好我们不会像丁一那样(我毕竟不止于他的皮囊),我们明确理想的位置。

你说“理想不对现实负责”,其实这也是我的意思。丁一和“丹青岛”的失败,正是要从反面来表达此意,即不管多么真诚、美好的愿望,一旦要靠权力来维系,便面临着一种危险。无论是在历史中,还是在爱情中,对此危险的警惕远远少于对理想的畅想。

我执意要引入“丹青岛”,主要两个原因。一个:我不想让丁一行凶,尤其是当他与娥有了那

么美好的“戏剧”,以及对爱情有了那么深的理解之后。另一个:美好的理想却又是可能导致惨烈悲剧的;或者说,恨怨是可能在一瞬间酿造那样的悲剧的;或用佛门的说法是:恨怨,即已动了杀机。所以我想让这两种可能(结局)并列。说真的,我一直相信顾城绝不是谋杀,而是一时性起没管住他的那只野兽,虽然与他的心性不无关系。

我以为,“丹青岛”不等于顾城的那个岛,后者只是从前者中抽出来的一个理想因素,加一个惨烈结果,再无其他。当然,读者肯定会想到顾城的事,想到就想到吧,多想想也好。

我并不认识顾城,但我不认为他那是纯粹的“一夫多妻”。“一夫多妻”,或是由社会法权所认可,或是由个人强权所建立,丁与顾曾经都不是这样。只说丁一吧,其“乌托邦”的建立,并没有权力的参与,而恰是出于自由,和为了自由。只是当统一发生破裂,如果他要使用权力来维系,那便与“一夫多妻”没啥两样了。由一个自由的理想出发,竟又走回到权力或权力的边缘,这正是我想写的。

理想的危险在于,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人——尤其是男人社会所造就的,男人或男人意识——都有着权力倾向,或几千年权力文化留下的权力沉积。甚至,这竟是从动物阶段就存留下来的东西:基因。所以,基因是属于肉身(皮囊,丁一)的,而期求超越它的是灵魂(我,即人类自古的心魂取向,而非史铁生)。

那部电影的事就不说了。我又看了一遍,没有它,下边不好写。

就写到这儿吧。无论好坏,我也没力气再改了。就像跑马拉松,如果不知不觉多跑了两千米大概也能跑下来,但要是撞了线裁判又说还有两千米,我估计还能再跑的人就不多。

让大伙跟着忙活了老半天,只好请各位多多原谅了。只好向各位多多致歉了。

祝一切好!问候李章!

史铁生 2005/8/30

原刊编者注:信中所提《丁一》为史铁生长篇小说《我的丁一之旅》。

给小水的三封信

孤独

孤独不好,孤独意味着自我封闭和满足。孤独感却非坏事,它意味着希望敞开与沟通,是向往他者的动能。以我的经验看,想象力更强、艺术感觉更敏锐的人,青春期的孤独感尤其会强烈,原因是他对未来有着更丰富的描绘与期待。

记得我在中学期间,孤独感也很强烈,但自己不知其名,社会与家人也多漠视,便只有忍耐。其实连忍耐也不意识,但确乎是有些惶然的心情无以诉说。但随着年龄增长,不知自何日始,却已不再恐慌。很可能是因为,渐渐了解了社会的本来面目,并有了应对经验——但这是次要的,根本是在于逐渐建立起了信念——无论是对自己所做之事,还是对生活本身。

那时我还不像你,对学习有着足够的兴趣,只是被动地完成着功课。所以,课余常就不知该干什么。有时去去阅览室,胡乱翻翻而已。美术老师倒挺看重我,去了几回美术组,还得到夸奖,却不知为什么后来也就不去了。见别人兴致勃勃地去了田径队、军乐队、话剧队……心中颇有向往,但也不主动参加。申请参加,似乎是件不大好意思的事,但也不愿承认是不好意思,可到底是因为什么也不深问。然而心里的烦恼还在,于是,更多时候便只在清华园里转转。若有几个同学一块儿转还好,只是自己时,便觉心中、周围、乃至阴云下或阳光里都是空空落落,于是很想回家。可真要回到家,又觉无聊,家人也不懂你,反为家人的无辜又添歉意。其实自己也不懂自己,虽终日似有所盼,但具体是什么也不清楚。

到了“文革”,先是害怕(因为出身),后是逍遥(实为无所事事),心情依旧。同学都在读闲书,并津津乐道,我便也跟着读一些,但对经典还不理解,对历史或单纯的故事又没兴趣,觉得生活好生地没头没脑。

那时我家住在林学院,见院里一些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打篮球,很想参加进去,但就是不敢跟人家说“也算我一个”,深恐自己技不如人

(其实也未必),便只旁观。人家以为我不会,也就没人邀请我。没人邀请,看一会儿我就回家了。时间一长,就更加不敢申请加入。甚至到食堂去买饭我都发怵。我妈让我先去买好,等她下班来一起吃,我却捏着饭票在食堂门前转,等她来了再一块儿去买。真不知是为什么,现在也不知道,完全是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
十六——十八岁,此状尤甚。记得我妈带着你妈——那时她才三四岁——到邻居家玩去了,喊我去,我也不去——可能是因为,觉得跟些妇女一块混很不体面。她们都以为我在读书,其实我是独自闲呆;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,一会儿坐,一会儿卧,一会儿想入非非,一会儿茫然张望窗外,仍不知这是怎么回事。烦恼,不过是后来的总结,当时也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过。

现在回想,我的第一本能是好胡思乱想,常独自想些浪漫且缥缈的事,想罢,现实还是现实,按部就班地过着。对这状态最恰当的形容是:心性尚属蒙昧未开——既觉无聊,又不知那就叫无聊;既觉烦恼,又不知烦恼何由;既觉想象之事物的美好,又不知如何实现,甚至不知那是可能实现的。至于未来,则想也没想过。现在才懂,那就叫“成长的烦恼”。身体在长大,情感在长大,想象与思考的能力都在长大,但还没能大到——比如说像弈棋高手那样——一眼看出许多步去,所以就会觉得眼前迷茫,心中躁动。就好比一个问题出现了,却还不能解答,就好像种子发芽了,但还不知能长成什么树;或就像刚刚走出家门,不知外界的条条道路都是通向哪儿,以及跟陌生的人群怎样相处,烦恼就是必然。如果只是棵树,也就容易,随遇而安。如果压根是块石头,大约也就无从烦恼,宇宙原本就是无边的寂寞。但是人,尤其还是个注重精神、富于想象的人,这世间便有了烦恼。人即烦恼——人出现了,才谈得上烦恼。佛家说“烦恼即菩提”,意思是:尚无烦恼,一切美好事物也就无从诞生。

想象力越是丰富、理想越是远大的人,烦恼必定越要深重。这便证明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。现实注定是残缺的,理想注定是趋向完美。现实是常数,理想是变数。因而,没有冲突只能意味着

没有理想,冲突越小意味着理想越低、越弱,冲突越强,说明理想越趋丰富、完美。善思考,多想象,是你的强项;问题是要摆清楚务虚与务实的位置,尤其要分清楚什么是你想做也能做的,什么是你想做却没有条件做的,什么是你不想做但必须得做的。只要处理得当,这——现实与理想的——冲突超强,创造力就超强。

所以,我看你从事艺术或思想方面的工作也许更合适。但不急,自始至终都是一条笔直而无废步的路是没有的。路是蹚出来的,得敢于去蹚。但话说回来,对每一步都认真、努力的人来说,是没有废步的,一时看不出作用,积累起来则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,甚至有大用。况且,一切学习与思考的目的,并不都是为了可用,更是为了心灵的自我完善。

我能给你的建议只是:直面烦恼,认清孤独,而不是躲避它、拖延它。内心丰富的人,一生都要与之打交道;而对之过多的恐惧,只是青春期的特有现象。就像你,考试之前紧张,一进考场反倒镇静下来了。就像亚当·夏娃,刚出伊甸园,恐惧尤甚,一旦上路则别有洞天。要紧的是果敢地迈出第一步,对与错先都不管,自古就没有把一切都设计好再开步的事。记得有位大学问家说过这样的意思:别想把一切都弄清楚,再去走路;比如路上有很多障碍,将其清理到你能走过去就好,无需全部清除干净。鲁莽者要学会思考,善思者要克服的是犹豫。目的可求完美,举步之际则勿需周全。就像潘多拉盒子,每一答案都包含更多疑问,走路也如是,一步之后方见更多条路。更多条路,又只能选其一条,又是不可能先把每条都探清后再决定走哪一条。永远都是这样,所以过程重于目的。当然,目的不可没有,但真正的目的在于人自身的完善。而完善,唯可于过程中求得。譬如《命若琴弦》。

舅舅 07—10—18

恐 惧

孤独源于恐惧,还是恐惧源于孤独?从现实中看好像是互为因果,但从根上说,应该是恐惧

源于孤独。就是说,人最初的处境是孤独,因为人都是以个体身份来到群体之中。你只能知道自己的愿望,却不知别人都在想什么,所以恐惧。恐惧,即因对他者的不知,比如一条从未走过的路,一座从未上过的山,一个或一群不相识的人。这恐惧的必然在于,无论是谁,都必然是以自己而面对他人,以知而面对不知,以有限而面对无限。可以断定,无此恐惧的倒是傻瓜。反过来说,这样的恐惧越深,说明想象越是丰富,关切越趋全面。比如说,把路想象得越是坎坷就越是害怕,把山想象得越是险峻就越会胆怯,把别人想象得越是优秀就越是不敢去接近。惯于这样想象的人,是天生谦卑的人。

谦卑,其实是一种美德。有位大哲说过:信仰的天赋是谦卑。谦卑而又善思的人,一定会想到“压根”和“终于”这两个词——我们压根是从哪儿来,我们终于能到哪儿去?换句话说:人生原本是为了什么?人又最终能够得到什么?——只有谦卑的人才可能这样问,自以为是的人只重眼前,通常是想不起这类问题的。甚至可以说,谦卑是一切美德的根本。唯有谦卑,可让人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;唯有谦卑可通向信仰;唯有谦卑能够让人懂得,为什么尼采说爱命运者才是伟大的人。(关于“爱命运”的问题,以后再慢慢说。)

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你看了吗?士兵许三多总是说“人要做有意义的事”。人们问他什么是有意义?他说“有意义就是要好好活”。人们又问他,怎样才算是好好活呢?他说“好好活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”。看似可笑,循环论证,但他绝对是说出了一个根本真理——人最初的愿望一定是“要好好活”,而最终所能实现的,一定是由自己所确认的“有意义”。为什么?因为,以人之有限的智能,是不可能把世间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的,而只可能向着尽善尽美的方向走。所以,只要是在走向你认为的“有意义”,就是“好好活”了,就是活好了;反过来说,为了活好,就要做自己确认是“有意义”的事。此外,还能怎样好好活呢?

不妨把许三多的话翻译得再仔细一点儿:事实上,没有谁不想好好活,然而,却非人人都能为

自己树立一种意义,确信它,并不屈不挠地走向它。原因是,人常把外在的成功——比如名利——视为“有意义”。可是,首先,面对无限的外在,走到哪一步才算是成功了呢?其次,外在的成功,也可以靠不良手段去获取,但这还能算是“好好活”吗?

其实,从根本上说,什么是好,什么是善、是美,乃是一个自明的真理,不用教,谁心里都清楚。否则也就不能教,不能讨论,因为,尚无一个共同的坐标系——即善与恶、好与坏、美与丑的基本标准,人与人之间是根本没法儿说话的。有人以此来证明神的存在。

所以,只有内在的成功,才真正是“有意义”。何为内在的成功?我想,只要人确信自己是在努力地“好好活”,不断地完善自己,就是内在的成功。至于外在的成就有多大都无所谓,至于跟别人比是高还是低都可以忽略。你发现没有,一跟别人比,你就跑到外在去了?一到外在,恐惧就来了,意义就值得怀疑了,脚下就乱了,不知道怎样才算是“好好活”了。

《士》中那个班长,让许三多做一个单杠动作,许三多总是数着数儿做,三十个已觉不易,便掉下杠来。班长说你数个屁数儿呀,只想着做动作!结果他做了三百三十三个。

佛家和道家都讲,要心无旁骛——即不受他人、他物、总之是一切外在因素的影响。啥意思?说的也就是:要抱紧自己心中的“好好活”,那本身就是“有意义”;要一心走向自己确认的“有意义”,这本身就是“好好活”。所以,许三多的话绝非循环论证,而是一个完美的自治系统——你只有靠内在成功来确保意义,你只有在自己确认的意义中才能获取成功。

但是,谦卑的敌人是胆怯。不过呢,谦卑与胆怯常又是双胞胎。如何能够既保持住谦卑,又克服掉胆怯呢?真是挺难。但只有细想,你就会发现,谦卑又是内在的,从不跟别人比,而胆怯必定是因为又跑到外在去了——惧怕他者。爬山怕山高,走路恨路长,而面对他人则害怕被看不起——岂不是又跑到外在去了?所以,千万要保持住自我——这并非是说称王称霸或轻视他人,而是说,一切事,都以完善自我为目的。帮助他人

也是为了完善自己,向别人讨教也是为了完善自己,爬山、行路、做题、交友,一切事都是为了完善自己,即便是遭人嘲笑,也一样能够从中完善自己。一旦太要面子,就又跑到外在去了——是以别人的目光在看自己。很多应该做的事,不想做,不敢做,这时只要想想我是为了完善自己,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完善自己,当然不是为了满足虚荣,而是就像老财迷敛钱那样,一点一滴地壮大自己心灵、品德——如此,何怕之有?

其实,你的一切问题,都在于胆怯。其实我也是,一上讲台,看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,脑袋里立刻一片空白。细究其因,还是因为跑到外在去了,生怕讲不好,落个名不副实的名声。有几次坐在台上,我忽然想到了这一点,心说去他妈的,只要讲的是我真心所想就行,于是立刻回归内在,便也滔滔不绝起来。交友也是一样,一怕,准就是想到了别人的目光和评价。我知道这事改起来难。本性总是比理性强大。但这不说明不应该去试试。为什么要试呢?为了自我完善:看看我能不能放下虚荣,不怕嘲笑(也未必就会遭到嘲笑),看看我的胆量,看看在我通常的弱项上能否有所改善。是呀,完全不怕几乎是不可能的,但是,怕着,也要去试试,视之为历练自己的一个步骤、完善自己的一步行动——我的经验,只要一这样想,就不那么害怕了,就什么都是可能的了。事后,果然有人嘲笑你的话,是自己错了自己长见识(又完善一步),是别人错了却还嘲笑你——你慢慢体会吧,这其实并不太难过。

舅舅 07-11-8

最有用的人事

以我的经验看,不管对什么人来说,也无论在什么局面下,有三件事是最重要的。第一是分析处境,做到“知己知彼”。所谓知己,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,能干什么;知彼呢,就是要弄清楚外部条件允许你干什么,和要求你必须干什么。前者是估计了你的能力,而后设定的理想或愿望。后者则包括:你想干,或者也能干,但阻碍巨大到希望非常渺茫的事;以及你不想干,但必须干的

事。也可以说,前者是目标,后者是为达到目标而铺路。

想干什么,直接就能干什么,世界上几乎没有这样的事;除非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,运气又是出奇地好。好运气来了,当然要抓住它,但任何时候都不要指望它。任何时候都要立足于自己的清醒、决断和行动。

这就说到了第二件最重要的事:决断。即在“知己知彼”之后,要为自己做出决定。决定的要点在于,一旦确认方向,就不要再犹豫。正所谓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”,决定也是这样,做决定时要谨慎、周全,一旦决定就不再怀疑,做到心无旁骛,切勿浅尝辄止。人们常说:成功就在“再坚持一下”之中。

第三件事叫做:开始。前两件事完成之后,就要立刻开始,万万不可拖延。拖延的最大坏处还不是耽误,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,甚至丧失信心。不管什么事,决定了,就立刻去做,这本身就能使人生气勃勃,保持一种主动和快乐的心情。

总而言之是三件事,或三个步骤:知己知彼→做出决定→立即行动。这三件事或三个步骤,不单对一时一事是最有用的,在人的一生中都是最有用的。

舅舅 07-11-22

给王朔的信

王朔:好!

……

你说耶稣有点吹牛逼,可我倒是觉着佛的话才真是大。是佛把人的愿望归总成无苦而极乐,然后说:“行嘞,听我的,这事儿我就给你们办了!”而耶稣说的是:“想一点麻烦都没有吗?这事儿我办不了(办得了他也不至于上十字架了),我只能给你们指条道儿。”——这样的话当然佛经和圣经里都没有,但从佛祖得其不坏之金身和耶稣唯落得一个横死看,这话也就隐含着都说了。

有个真实故事:某东人笑某西人:“你们那神就差着份呢,连自己儿子的事都管不了!”

刘小枫有篇文章,或可消除人们对耶稣及上帝的错解。奥斯维辛之后,人们发现很多死囚写下的祈求,比如:“主啊,我不要求你别的,只求你让我死在外面的阳光下吧!”可就连这样的祈求主也未予应答。那么上帝,你到底算什么东西?文章说:事实是,基督的神不同于原始诸神,说白了,他不是那种万能的、有求必应的神。相反,基督的神是苦弱的神,除了派他的儿子与这苦难之世同在从而倡导一个爱字之外,他也没别的辙。

可佛的话我老是听着玄(悬)。他说你跟着我走我就带你去极乐去圆满,可极乐啥样他不说,为啥能那样他也不说。可能是人该问。问题是,他要只是说“听我的不得了,老这么问东问西的咱这事儿可就瞎了”——老实说,这语式让我想起共产主义。当然佛肯定全是好意,那我也嘀咕:这法子不会被贼人利用吗?

你说“中国民间的迷信把佛糟蹋得不成样子”,是否跟这法子给他们留了空有关?若信“人和神有永恒的距离”,愚昧崇拜就会少得多。人不崇拜人,问题就不大。人崇拜自然,崇拜最初的那个“有生于无”和“三生万物”有什么不好?

耶稣和摩西都不是神,顶多算个领头的。基督的神从无人格,完全可以把祂理解成创造之始,存在之初(如宇宙大爆炸)。而在这不由分说的创造中,隐含着无穷的可能,无穷的处境与道路,并不对人类有特殊的优惠(比如无苦而极乐)。但是,如果你能从这无穷的可能中听见某种可能,认出某条道路,你就能在这不由分说的处境中不再惊慌,不再抱怨,享受爱意(中国人老说爱是奉献,其实爱才是享受)。所以耶稣和摩西等人的跪拜,在我看来,一是对这不由分说的处境心存敬畏,一是为那爱意之福的可能心存感激,一是对寻找那条道路抱着虔诚与思虑。

你说佛也是指了一条路,这我当然赞成。不过,我赞成不是说我以为佛(或佛徒们)底根儿就这意思,而是说我赞成这样去理解(前信我说过,但愿“成佛”二字是进行态而非完成时)。有一条路是为了取,有一条路是为了行。显然,有头的路是指向取,没头的路你只好去行。以行为取,随时随地,一路贯穿。到终点去取的,半道上勾心斗角

就属正常。路一有头,心就都放在头上了。再说了,有头的路还算是路吗?到了头怎办?所以我看佛还不是指的路,还是指的果。当然佛也是多次强调行的,那么,这个果的引诱也许是更高一招的考验?

还有,路上的享受——爱意之福唯靠人行——都是明说的,而终点的福气一向还是个谜,得到头儿再看。有件事我常不解,科学干出了那么多神奇的事,可人们不说它神奇,气功之类稍显手段,人们就要崇拜,到底比事儿呢还是比招儿?是比招儿,弄不明白的事儿最抓人。尤其这弄不明白的事要是有人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办到了(比如猛不丁就蹿到另一维去了),他说什么大伙就容易信什么了。中国人尤重眼见为实。其实呢,他能办到的也不过九牛一毛,剩下的毛他也找不着,这人们就不计较。但凡全能和宣称全能的,我都听着邪乎。

什么是神?把守着、甚至是炫耀着神秘之门的是一种,这一种不大可能不要人去信仰,去崇拜——各类坛主,各类造人为神的事,多属此种。明说了,光得好儿的地方这儿没有,这儿只有走不完的路,走不完的路上能不能有享不完的福,那得瞧你自个儿的——这样冷冰冰不近人情的神,我看倒像没别的企图。

神,没有统一的定义,所以“有神论”和“无神论”都得看他到底怎么回事。

我可能又有点离谱了。咱还是说对死后的猜测吧。

其实人活着活着忽然见着死了,都会有个猜想。很多人不过是怕,一天天地拖着不想。一想,就得用理智了,要用感情(比如一厢情愿)。我曾经就是一厢情愿,这儿那儿全身像是没好地方了,我想不如死吧,死了就什么痛苦都没了(想死的人恐怕都这么想)。然后因为点别的事耽搁了,一下没死成,有工夫就又想:什么痛苦都没了是什么样呢?真是笨,想了好些年,有天终于眼前头蹦出句话:什么痛苦都没了,除非是什么都没了呗。是呀,要使痛苦无从产生,最可信可靠的办法就是什么都别让它有!我先是窃喜,紧跟着沮丧:咳,想了半天不就是小时候大人告诉我的那句话

吗?——死了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

可什么都没有了,既让人不痛快,又让人想不通。就像你说的:“目前的迹象很乐观,我们死后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。”对呀,还会存在,所以乐观。要是什么都没有了呢?当然也就什么都甭说了。所以我想,必须得把未来猜在有上!什么都可以没有,“有”却不能没有!先得让它有,一切事才好说,一切美好之物才能成立——老子真是说对了!可是这么一来,就不大好想象光有快乐没有痛苦是怎么个状态了,就算那不是人,是神,也还是说服不了谁。

当然我们可以谁也不说服,谁爱信不信。所以剩下的还是一个猜想。这猜想恐怕就要永恒了。但猜想是正当的。但猜想又是无限的。就是说,谁,怎么猜,都行。为自己猜多半是猜天堂,即那无苦而极乐之地。为别人(比如坏人)猜,地狱就诞生了。为自己猜而猜成地狱的,就有点不凡(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?”)。为别人猜也都猜成天堂的,更是菩萨心肠(普度众生)。但有一点是一样的,这猜的根据还在人间;比如痛苦,比如快乐,当然跑不出去还是人的经验。又因为,谁也不知天堂什么样,那一种存在是像孩子那样地惊喜,还是像老人那样终于也看出破绽?所以猜测也就有了无限的自由——谁怎么猜都行,怎么信都对。

所以猜想都是正当的,信(不说仰)是自足的,用不着科学来鉴定,更用不着理论来说三道四。明显的一个理由是:信是自足的,理论却不是,科学却要证明,而一旦证明起来谁也靠不了谱。明摆着:灵魂之在以及怎样在,压根儿不可证实与证伪。所以有这么一句话等着你就够了:你说到哪儿去也还是人的思与想,而那儿——死后状态——完全是人的思与想所不及的。

所以这种事只能是私密的猜想,说给人听也还是私密的猜想,甭想谋取公认。

不过,我倒觉着多想想也不坏。要是天堂肯定就在那边儿等着,多想想也不至于就丢了。要是本来没那么码事呢,礼多人不怪,多几手准备也好。

我生来是个缺乏自信的人,手拿把攥的事儿常还是担心。比如说,天堂是一种猜测,地狱也是一种猜测,二者等值,没理由说哪个胜过哪个。万

一哥们儿不幸错过了天堂可咋办?有备无患,此生我就像是走错了地儿,下回再不敢莽撞。就算天堂是一定的,多个心眼也没什么不好,顶多瞎操心呗。

要是不幸你真看到了这儿,那就当是一块儿吃了顿饭吧,没找好地儿,又贵又不好。下回咱吃别的。祝一家子都好!

铁生 2003 / 7 / 15

注:以上史铁生遗作均选自《收获》2012年第1期。有删节。

评论

上帝与政治

何怀宏(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)

史铁生是作家中的一个思想者,也是一个精神的不懈探索者。他不仅用人物与形象思考,也直接用概念思考;他读了很多非文学的作品,写下了大量思想随笔和散文。而在他的小说中,也有大量的思考。

极其重视思想、渴望一种信仰的精神、一种道德的纯洁感,这使他很像19世纪俄罗斯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。契诃夫对托尔斯泰的有些思想有不同意见,但是,他说,只要托尔斯泰的道德声望在,就能维持俄罗斯文学在一定高度之上。但是,史铁生的确又是很中国的,也是很时代的,他是20世纪中国的一面镜子。

作家不必是直接的思想者和信仰精神的探求者,也能写出很优秀的作品。然而,如果我们能够有同时也有一个深刻思想者和精神探索者的作家,则会是我们的幸运。

我想用几个词来概括一下他的思想和精神关注的主要空间和维度。

首先想到的是“上帝与政治”,这是美国一个哲学家施特劳斯思索范围的话。

这里的“上帝”是打上引号的。在史铁生那

里,它不是一个定名,而只是标志对一种超越于人的存在的探求和情感。他的信仰不是对一种特定宗教的信仰。这个“上帝”很高远,好像是在天上,但却可能作为人的精神的根基或统摄起作用。而“政治”则是地面,地面不那么纯粹,不那么干净,甚至有很脏的地方,但这“地面”却极其重要,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“地面”作为我们生活的平台。

而我觉得铁生是对这两方面都很重视的,他同时都重视。而且,在他那里,“上帝与政治”并不是分开的,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这很重要,如果只有“上帝”而不关心社会政治,那可能我们会觉得信仰者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,只是用他们自己的一套语言说话,和我们有一种隔膜;而如果只关心政治,那么就可能一心去膜拜地上的“君王”,无论这“君王”是权力还是金钱。人的心里如果完全没有“上帝”,从来不仰望天空,就可能太执着于人间的蝇营狗苟和成败得失,就可能虚无、绝望,乃至无所不为、无恶不作。而如果我们不重视大地,不重视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善,大地也可能裂为深渊。而史铁生一方面尊重他人的信仰,他自己也在信仰的路上。他渴望的“神”似无定名,但却有定在。另一方面,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不仅不排斥,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关注。他思考平等与差别、思考英雄与奴隶、思考人权与法治等许多社会政治的问题。

换言之,史铁生的地坛也是天坛,在他那里,地坛和天坛是相通的。比如,当史铁生说,“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色的差别,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。”而唯有当在理想的神坛上树立起人的平等,才可望有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现实。以及“当正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喜悦”的时候,我们却有必要“以全人类的名义,对这些最不幸的罪人(也是“敌人”)表示真心的同情”。我们就看到了“上帝与政治”的这种联系。历史地看,众生平等思想与普遍法治的产生是和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,而即便在今天,宗教信仰大概也是一个进入对平等法治信念的一个有力途径。而一种宗教性的深厚悲悯,还有助于防止那种将“敌人”绝对污名化的你死我活的打杀。

当然,在这上、下两端之间,也还有中间部